

# 二十世纪宗教地理学的发展与现状

Lily Kong

**一、历史发展** 自古以来,地理就与宗教有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二十世纪是宗教地理学富于变化的时代,但在一些方面仍保留和继续着原有的研究内容。归纳起来,我们可以把这些变化分成几个各具特征的阶段。

**1. 环境决定论阶段** 宗教地理学中的环境决定论观点是原有观点的承袭。Ellen Semple (1911)认为,宗教的形象和象征意义受其诞生地的影响:爱斯基摩人的地狱是充满黑暗、

是污水排放及环境污染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城市里排放的污水流入安曼溪,该溪的水再注入扎尔卡河。城市东北部安曼溪沿岸的田地,如鲁塞塔和扎尔卡附近的田地,都用此河的河水灌溉。这个地区主要生产蔬菜,供应周围的城市,其中安曼市的居民744000人,扎尔卡市255000人,鲁塞塔市588000人。

1979年该地区曾发生多起霍乱病。据称,这是吃了安曼溪沿岸种植的蔬菜的结果。此后政府曾下令把菜地毁掉,并且禁止用该河的水灌溉蔬菜。结果就有300公顷以上的农田不能直接利用。直到今天仍有部分废水从安曼市流入扎尔卡河。扎尔卡河的水储存在皇家塔拉尔水库内。约旦河谷的另一些土地也用这里的水灌溉。然而,单从安曼市和扎尔卡市的工矿企业里排出并流入扎尔卡河的污水每天新有7207立方米。到了夏天污水的排放量往往相当于一条小河。

安曼的城市用水有一部分来自阿兹拉克——绿洲(安曼市城南80公里处),最近也从沟通约旦河的古尔运河东段获取。这样就使得干旱地区的水资源更加短缺,而造成土地盐碱化。因为那里已没有足够的水用来冲走土地中的盐份。

**4. 结论** 截止到1986年底,大安曼计划建房占地面积为3815平方公里。这就意味着有相当数量的农田要损失掉。这么大的地方并不能立即都建上住房,这是事实。在经济不景气也已经在约旦开始了一段时间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基础设施,特别是公路网的建设,以及新的国际机场(昆阿利亚国际机场,1983年开始兴建),和联接机场的骨干高速公路的建设,加快了市区及郊区的扩充速度。居民们将把安曼扩大了的空间住满。这种趋势显然是存在的。因为约旦王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8%。另外,安曼市有27%的家庭只住着一间居室,有28%的家庭住的是两间居室。一旦收入改善,或者有机会在石油输出国工作,那么从贫穷地区向较近大空间迁居的欲望会大大增加。由于缺少种好现有农田的法律,上述趋势会有增无减。过去数年中雨田种植区农田不断损失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而约旦高地上那些无论如何怎么说都有有限的可耕地。

安曼市区及其郊区和卫星城扩展,还有随之而来的人口集中的实例表明,在农用土地有限的地区,如此无任何计划地进行城市化会有什么结果。不仅对土地采取了不适当的利用方式——这种方式到处清楚可见——造成的农田损失会酿成农业减产,而且城市化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即,人类赖以生存的饭碗都有被自身的所作所为彻底砸掉的危险。是沿着这条充满危险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还是优先安排农业区,使之有计划地发展,令人拭目以待。

赵鹤平译自《Erdkunde》1987年41卷3期,杜洪涛校

风暴和酷寒的地方,而对犹太人而言,地狱则是永远燃烧着烈火的地方。Ellsworth Huntington (1945) 指出,人们崇拜的物体受地理因素影响,如雨神是印度最重要的神之一,因印度的降雨很不稳定。在Hultkrantz (1966) 看来,自然环境为宗教活动和宗教观念提供了物质基础,宗教仪式、信仰和神话也从不同方面利用了自然界的東西,比如,神在社会生活中往往以某些动物的形式出现;死后和生前的世界常被认为具有同样的模样,只是删去了一些生前世界的特征等。

2. 宗教影响环境阶段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Max Webber推翻早期环境决定论观点,引出了可谓是本世纪宗教地理学最有意义的转折。他呼吁应该研究宗教对社会经济的作用,而不是环境对宗教的影响。这一观点在二次大战后得到广泛地接受,从而出现了许多把宗教作为一种改变环境、景观的意识动力的研究,至今仍经久不衰。

强调宗教对改变环境、景观作用的思想,在过去二十年中一直居统治地位,Isaac (1959, 1960) 对宗教地理学的定义即是一例。他说,宗教地理学就是对人为景观改造中宗教所起作用的研究。在他看来,宗教地理学的任务就是“把宗教与社会、经济和族裔因素区别开来,研究它与其他因素相比,在景观改变中的相对重要性”。

3. 相互影响研究阶段 对于宗教与环境间单向关系的研究,一些学者大加责难。特别是地理学者在研究宗教地理时,被认为应该对宗教与环境作相互关系研究,因为宗教与环境的关系是辩证的,仅作单向关系研究不切实际。虽然强调这种相互关系的呼声越来越大,但这种研究是否能持续下去,现在仍难以论断,尽管这一方向确实有重要意义。

4. 其他发展 除了前述的发展变化,在最近十年里,宗教地理学在其他几个方面也有改变。首先,是日益社会地理化的倾向,不同于早期的文化地理倾向。正如Buttner (1980) 所强调的,研究的重点应是宗教与环境间的中间力量——宗教组织或团体。他认为,宗教对景观的改变并不来自宗教本身,而是宗教与环境关系中的每一种联系。因此,宗教组织、团体,它们的空间结构、活动、精神状态、有关的职业、社会结构、休憩行为等,都成为主要研究内容。

第二个方面的变化是本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世界性的世俗化(非宗教化)。在此过程中,宗教不再象从前,在改变景观中起重要作用,而是在走下坡路。然而,谁也没料到,近年来原教旨主义在伊朗等地的复活,苏联、东欧国家宗教活动的抬头,这为宗教地理研究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二、现状** 当今宗教地理学的研究大致有三种倾向,它们均有不同的侧重点。

1. 传统文化地理学倾向 这种倾向在许多宗教与地理的研究中都有反映。宗教被当作影响文化景观的超自然力量,研究重点不在影响的过程,不在被影响的景观上,这方面研究甚多。

首先,地理学家研究了宗教影响的空间模式,如宗教的空间扩散、宗教团体的地域转移等,不过多数都是罗列一些地理、历史史实。有少数人也曾尝试对相关社会、政治条件作些分析。地理学家还研究了特定时间宗教团体的空间分布,但也有明显的描述性色彩,仅个别例外。Hershkovitz (1987) 分析了异教犹太人分布后指出,以色列人的分布模式是他们信仰宗教程度的函数,极端的信教徒的分布不同于一般教徒和不信教者。这种研究以宗教作为划分文化区域的标准,或许有助于了解一个国家的总体文化特征及其差异,然而不大可能有大的贡献,因为划分宗教区域的标准就有问题,并且这种划分到底有多大意义仍值得怀疑。

第二,研究宗教对景观自然形态影响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对公墓的研究。研究之一是将公墓视为一种“空间利用现象”,考虑的因素如位置、城市地价、土地需求等。其二是把公墓作

为一种文化特征,反映文化、历史特征,Jackson(1967—1978)指出,美国公墓的时间变化反映了文化价值观的改变,从把它作为纪念个人的“纪念碑”,变化为当今激起情感和在一种庄严、优雅环境中给人以安逸的地方。正如Howett(1977)指出的那样,这种变化可很好地加以利用,应舍弃单一目的的公墓设计,代之以多用途的设计,使城市公墓地成为野生动物的庇护所或人们的消遣地。

除公墓之外,还有研究特定宗教给景观留下的痕迹,如对佛教、印度教及一些地方性宗教都有过这种研究。

2.“新”文化地理学倾向 传统的文化地理学认为只有单一文化,而现在越来越意识到在同一社会里多元文化的存在事实,而且往往在主导文化与从属文化间有利益冲突。从宗教角度而言,这提供丰富的研究课题。如Shilhav(1983)探讨了非宗教与宗教机构在对土地需求上的利益冲突,在日益城市化的时代,这种冲突是很大的。

在象征意义上,宗教与政治可以各得其所,如Lewandowski(1984)对印度马德拉斯后研究指出,政府借助印度教及象征,建设了一个功能性城市景观,同时也达到了其政治合法性,在重新命名地名和雕塑时考虑了民间的和宗教英雄,达到了替代早期殖民影响的目的。

对宗教地点政治象征意义的兴趣反映了对地点象征意义的普遍兴趣,这些被标榜为“新文化地理学”一部分的兴趣实际上并不那么“新”,早在几十年前就有论及。Deffontaines(1953)指出,许多文化背景下都显示出宗教对房屋形状、方位、紧密程度的影响,特别地,门和窗对特定的宗教团体有特定重要性,因为它们是与鬼神的接触面。Wheatley(1971)研究了中国宏观世界(宇宙)与微观世界(城市)间的对应后指出,中国城市的象征作用加强了其功能上的整体性。

近些年来,宗教地理学者也研究了变化中的文化、社会环境里教堂的象征意义。

3.宗教生态学倾向 宗教生态学(religious ecology)也称作环境伦理学(enviromental ethics)和环境神学(enviromental theology)。这方面的研究集中在“林怀特争论”(Lynn White debate)和宗教思想对动植物生态的影响两个方面。

1967年Lynn White的“当今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引出了一场关于谁是造成地球环境日益退化的罪魁祸首的争论。他认为,环境退化是基督教里上帝赋与人类主宰地球的思想所致,为了防止环境的进一步破坏,人类有两种选择:要么改进基督教,采纳St Francis的观点,St Francis被视为生态保护神;要么全盘扬弃基督教,代之以非西方宗教,如禅宗。

怀特的观点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对其评价褒贬不一。一些人同意其基本观点,即基督教是祸根,但指出,同自然更和谐的非西方宗教,在防止环境危机方面却并未有更大的建树,这些人因此建议,用与现代生态、环境观点更协调的神圣教义来改进基督教,Toynbee(1972)把环境危机归因于一神论的宗教,因为单神论的宗教不能限制人类的贪婪。他的解救办法是采纳泛神论和东方宗教。当然,也有学者对东西方宗教都加以否定。

也有为基督教辩护的。Glacken(1967)等人争辩说,《圣经》教义中包含有对自然界的关心,而不是怀特所说的那样。Doughty(1981)也指出,基督教思想极丰富、极复杂,不能简单地指责它是敌视环境的,况且,持有某一观点并不等于就采取与之相应的行动。

Hargrove(1986)对这种争论有中肯的评述。他说,把我们对东方思想将威胁西方文明的担忧,转移到环境危机将威胁整个人类文明上来,将是更有意义和必要的。

宗教思想影响动植物生态的研究有两个方面。其一,许多学者研究了宗教对看待动植物生命态度的影响。在这方面,印度的宗教思想受到广泛的注意,特别是“神牛争端”(sacred

# 为土地利用规划而进行的湿地水文地质评价

Arnold L. ÓBrien, Ward S. Motts

**摘 要** 湿地一般出现在地质、水文及地形沉降发生变化的地区。它具有多种水文地质特性,更确切地说,湿地是一个有机层——它是整个水文地质系统的一个元素。湿地的三个明显而相关的作用是:(1)改变盆地的径流特征;(2)影响排水或补给水与地下含水层的关系;(3)在湿地控制的盆地中,影响地表水发育潜力。因此,研究湿地的主要目的就是解释它在区域水文中的各种不同作用,阐述地质、水文和地形因素在湿地形成、发展中的差别。地质和水文因素包括地表物质的特征和厚度,基岩类型,水文位置,有机层的渗透系数,湿地的导水系数、质量及与含水层的水文联系。地形因素主要与排水盆地、湿地的相对大小和绝对大小有关。为了给水文地质学家及土地规划者提供帮助,本文建议选择使用涉及水文位置、地形位置和地质类型的因素对湿地进行分类。

**前 言** 由于城市水侵及附近湿地流域的危害,23个国家已颁布立法,保护公民免于洪水、污染及由于湿地发展造成的水资源短缺。可是,人们也渐渐意识到,湿地不仅仅是单一因素作用的产物,而是在地质、水文及地形条件的多种因素下产生的。实际上可以说,湿地是一个流域的水文反应。因此,本文的中心问题就是确定湿地中具有划分意义的生成条件。笔者在此提出一个湿地评价系统,以便对土地利用规划及了解湿地水文提供一些帮助。

cow controversy)。其二,研究了宗教对动植物驯化、扩散的影响。中心观点是,驯化动物并不单纯出于经济原因,而同宗教仪式、神有关。

**三、问题与展望** 地理学与宗教的交叉产生了大量的研究课题,其中许多仍待探索。研究的侧重多在宗教对景观改变的意识动力作用,即带有传统的文化地理学倾向。除此之外,宗教地理学者没能涉足到其他可能充满希望的领域,部分的原因是学者们划地为牢,不敢贸然另辟溪径。又有一个问题是,各种研究对地方性宗教、神话及个人宗教经历重视不够。

今后进一步研究方向之一是,环境中特定物体、景观以及建筑物被赋与宗教意义的过程。为什么是这些象征意义而不是别的?精神的东西是如何表达和传递的,特别在一些语言尚不足以表达感情的地方?政治和文化是怎样相互作用,最后达成对特殊地点意义分配的一致?难道不应该分析一下权力关系?

正如Jackson(1988)强调的,几乎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从属团体与支配团体抗争的区域战略均有待研究。因此,“抵抗地理学”(geography of resistance)将会并且一定能成为宗教的研究内容。

地理学者还应考虑宗教与环境(包括社会)的相互关系。虽然宗教对景观的影响已有充分研究,但反过来则不然。在已有的研究宗教影响环境的文献里,几乎没有地理学家对宗教如何影响社会关系注意过。受到冷落的机能主义观点,即宗教的明显功能和潜在功能观点,应该给予重视。

张剑光、王汝正、詹小国、薛海民摘译自《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1990第4期 赵汝植校